

哲学学风和哲学教育

□ 陈亚军

问题乃哲学的生命催化剂,没有了问题也就没有了哲学,问题意识的薄弱意味着哲学生命力的衰退。一旦哲学不再能或不再追求解决问题,而只是躺在历史的古墓里自我玩味,它也就实际埋葬了自己。

哲学教育受制于哲学学科的大氛围,从教育理念到教学方式,后者的左右力量都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目前我国的哲学界,笔者除了赞赏、肯定之外,更有深深的担忧,因为事实上,哲学界的学风问题已对我国的哲学教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值得特别的关注。

问题之一:重智慧不重精确。

智慧历来是哲学的追求,“哲学”一词的本意就是“爱智慧”,故不能说重智慧有什么不妥;况且现在的哲学不是智慧太多,而恰恰是智慧贫乏。所以,这里的重智慧不重精确,不是贬低智慧,而是着眼于理想的哲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什么意思呢?笔者以为,现代哲学和古代哲学的最大不同之一,在于后者更看重智慧而前者更强调精确。在现代社会,人们破除了古代式的对于权威的迷信,怀疑精神盛行,一种学说,除非有确切的论证,否则难以说服于人。思想的闪光,美妙的结论,如果没有详细的证明作支柱,都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论敌推毁的。哲学是一门说理的学问,和宗教不同,它必须用道理而不是形象、魅力等征服人心。这道理必须是细致的,缜密的,以至是论敌难以攻破的。就像柏林所说,哲学的论证好比摆在城墙上的重武器,用它可以击退敌人。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的哲学界对此还远远不够重视。一篇论文,能证明自己价值的,是提出了多少多少新观点;论证也是有的,但是否达到精确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种风气必然影响到我国的学生对于哲学的理解,其结果就是想方设法地滥造美丽的思想大厦,而不在意这大厦的根基是否牢靠。

问题之二:重体悟不重逻辑。

这一问题与上述问题相辅相成。体悟和逻辑都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两者所得结果有所不同。贺麟先生曾经说过,逻辑方法来自数学,目的在给我们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这知识是坚实可靠的,只有这种知识才够称得上科学知识。逻辑方法的特点是只问本性不问效用,只重事实,不重价值、利益。所以,一个人是否用逻辑方法思维,就看他是否能破除偶然性的事实,摆脱实用的目的,而去探讨事物的普遍必然的本质。这是西方哲学历来采用的思想方式,和其相对的是更具东方哲学特色的体悟方式。体悟方式更重视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反省自己。对于事物,用设身处地、同情的态度去思考。它强调的是虚心忘我,深入事物,领会其意义和价值,而不从外表去描述或概观。这是一种亲切的、“可爱的”求知方式,然必须以深厚的生活根底做基础。哲学本不该在两者之间厚此薄彼,但从哲学的基本训练着眼,逻辑的思维方式首先应该为哲学的教育所重视。必须把话讲清楚,把思维理清,然后的体悟才不仅是“可爱的”也是“可信的”。美国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前哲学系主任普特南在回答“为什么哈佛大学哲学系不那么重视欧陆哲学”时说道,不是不重视欧陆哲学,而是在此之前首先应该训练学生的基本哲学思维能力,即首先应该加强逻辑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训练,然后再进入对于(更须人生阅历的)欧陆哲学的学习。记得李泽厚先生也曾说过,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的训练应是我国哲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这和普特南上面的说法应是出于同一考虑。

问题之三:重知识不重思考。

这是一个早已被人提起的话题,它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在我国哲学界相当普遍,也波及到了对于哲学教育的理解。师生双方都习惯了讲求知识的积累,思考似乎是将来水到渠成的事情。教的一方终归是“教”,学的一方终归是“学”。久而久之,大脑被塑造成了书柜,里面展览着古人、洋人的书籍,思维不但未见活跃,反而愈发僵固了、死寂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已告诫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问,学富五车不等于可成为哲学家;哲学和其他学科的不同点在于,它往往不是为我们提供新知识,而是对已有知识的一种格式塔式的再诠释,是一种全角度的转换,通过这种转换,我们对已有的一切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于是,哲学就不能只满足于形而下的知识的积累,而应该(也必须)上升到形而上的自由领域,作无拘束的思考。这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价值所在。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来说,既要有丰富的学养,同时也要保持精神的空灵状态,对已有的所谓“定论”做无定的反思。这样说,丝毫没有否定追求知识的意思,思考必须以知识为前提,没有知识,思考无从谈起,但是,我们不能忘了,知识积累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对此是否还有分歧,但至少在我看来,下面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知识积累的目的旨在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思考。

问题之四:重历史不重问题

学术界研究历史蔚然成风,哲学研究蜕变成了哲学史研究。热衷于梳理古人、洋人学说,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以我思为立足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除去其他原因不论,应该承认,很多人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由于历史话题的研究不论怎样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比较实在的成果,因此比起殚精竭虑的思索问题来,似乎“投资风险”更小,这对于哲学的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误导,使我们的学生往往只擅长搬运他人的精神食粮而不敢去碰重大理论问题;学术界往往不但不鼓励对于问题的敏感反而扼杀这种敏感。说起古人、洋人的看法,头头是道,久而久之,学术的自信越来越弱,最后甚至不敢说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更习惯于说某某人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然而,问题乃哲学的生命催化剂,没有了问题也就没有了哲学,问题意识的薄弱意味着哲学生命力的衰退。研究历史,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如果本末倒置,研究历史便失去了意义。古希腊哲人尚有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胜于继承王位的境界,作为后来者,难道我们真的变得如此不堪?一旦哲学不再能或不再追求解决问题,而只是躺在历史的古墓里自我玩味,它也就实际埋葬了自己。这并不是要否定历史研究,真正的历史研究是有深厚现实感的,是有浓重的问题意识的,应该反对的是忘却问题的所谓的历史研究。

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铸造未来的学术传薪人,是培养未来的学术研究者,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学术的命运,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针对眼下哲学界而言,有它的特殊性,是否适用于其他学科,不敢臆测;而且究竟目前我国哲学界的症结何在,说法也一定是见仁见智。所有这

些都是值得讨论的。

如果笔者对于问题的上述概括可以成立,而为纠正这些问题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偏狭,似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的训练:

首先是精读原著。这一点我们一直都挂在嘴边,但很少真正落在实处。这里所说的“精读”是逐句逐段的精读,是精益求精的细活。学生一开始对此会感到不适应,觉得单调枯燥,但一段时间之后,其益处就会愈益明显。它不仅使学生对于所读的原著富有自信,对于自己把握的部分明白无疑,从而为下一次的再读奠定一个确定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使学生熟悉了哲学家本人的论证风格和技巧,经过长期的熏染陶冶,自己的哲学思维能力和论证能力就会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笔者碰到过不少这样的学生,他们思维敏捷,表达流畅,但是当你就一个话题深入追问下去时,便会发现他们的思考还浮在浅表,好象仅仅停留在软土层,缺少的是凿挖思想岩石的钢锹。这需要锻炼,需要细致的精读经典原著。读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不懂之处在哪里。

精读原著直接关系到哲学学养的积累,它是未来哲学思考的基础。如果一个治西方哲学的人没有精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笛卡尔的《沉思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西方哲学最基本的经典著作,很难想象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西方哲学的阐释者;如果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没有精读过《论语》、《孟子》、《道德经》,也很难想象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哲学的阐释者;而如果不论是何种经典都没有认真精读过的人,则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善于作哲学思考的优秀学者,除非他是天才。

其次是重视“研究讨论会”(seminar)。研究讨论会早已在西方大学流行,但在我国还鲜有所闻。这种讨论会的形式对于哲学教育尤其重要。它一般由一位导师主持,其职责是提出问题,理清线索,并就学生的发言讨论作出点评,加以归纳。而参与讨论的学生则须就某一话题独立地澄清自己的见解并予以论证。师生之间可随意辩难,讨论切磋。重要的不在于达成共识,而在于互动。这种形式的好处非常明显:它可以激发学生自己思考问题的兴趣,培养他们论证自己观点的能力,同时相互间的讨论还能够开阔视野,取长补短,并养成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辩论的雅量。笔者曾在自己的哲学教学中尝试了这种方式,收到相当不错的效果。这种讨论会的形式极大地活跃了学生思考问题、讨论问题的兴趣,课堂的气氛常常令人兴奋,欲罢不能,不仅学生从中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教师自己也从中获益匪浅,很多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深入明晰的。当教师就某一问题所阐述的观点和论证不能说服学生时,他就会反躬自问,是否哪些环节出了问题?相比之下,这是一种直接的反馈,它对教师自己的思考也很有裨益。

研究讨论会和精读原著是哲学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通过精读原著,积累学养,训练能力;而通过研究讨论会,则可径直面对问题,迅速走向学术前沿,寻找未来的学术突破口,故这两个环节是西方一些著名大学的哲学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哲学教育中,这两个方面均很薄弱。

最后,鼓励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学生阶段主要是研读,撰写论文会花去太多的时间、精力,且不利于养成厚积薄发的良好学术品德,往往会出现为写作而写作的坏学风。笔者非常理解并赞同这种观点,但认为鼓励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并发表,与这种观点并不矛盾。研读和写作,不仅不相互龃龉,反而相互促进。写作会使学生明白问题的所在,它给研读带来刺激,使研读有了目的,从而使研读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枯燥无味变得生动有趣。鼓励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并发表的另一个好处是,学生可以较早地学会撰写学术论文的规范。这里说的规范不是眼下学术界相当流行的“学术八股文”,不是行文的具体格式,而是学术论文的一些基本要求,如引文及出处的交代,如何安排注释等。这在国际上已成定规,它是学术交流与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写学术论文不同于写散文随笔,它必须一丝不苟、环环相扣,这是一种经长期训练方能获得的能力,而这种训练应该是哲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陈亚军: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曾德雄